

上海师范大学长江文化研究所编

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

陈平



上海书店出版社

长江文化丛书的出版必将

推动长江文化的研究工作！

沈德润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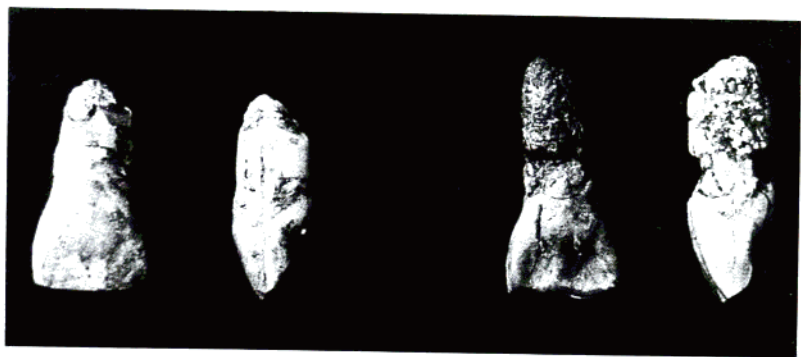
1. 长江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校党委书记徐千荣同志在大会上讲话。左起第四人为名誉所长、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将军；左起第五人为副所长、市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朱敏彦同志。



2. 校党委书记徐千荣同志(左)、名誉所长陈沂将军(右)为长江文化研究所揭牌。



3. 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沈德溶先生受聘为历史系兼职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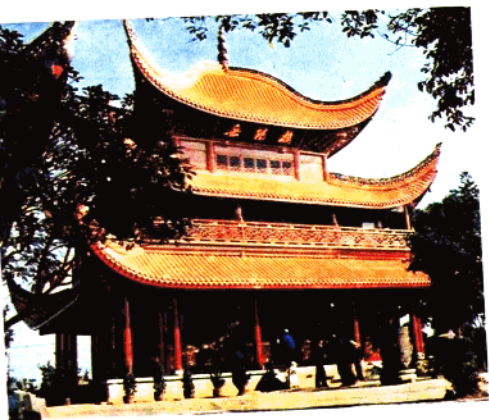
4. 元谋人牙齿化石 (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出土)



5. 三星堆青铜爬龙柱形器



6. 马王堆汉墓帛画



7. 岳阳楼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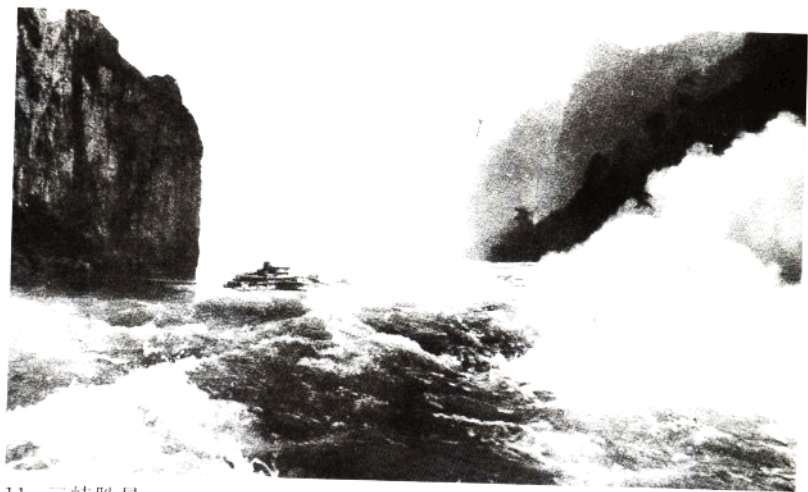
8. 白鹿洞书院



9. 西学东渐的先驱——利玛窦



10. 上海最早的天主堂
——董家渡天主堂
(建于1853年)



11. 三峡胜景



12. 越剧十姐妹

(前排左起: 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
后排左起: 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



13. 上海城隍庙豫园九曲桥



14. 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新貌

序

近代上海曾经是中西文化最先接触、碰撞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蜕变、演化、生长的实验场。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尽管风雨雨造成诸多负面效应，但上海得风气之先，以求新务实的步伐，改造着中国文化的外貌，丰富着中国文化的内涵，从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近代化过程。

现在我们负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同时也仍然面临着大量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任务，时代要求我们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奠定基础。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已经看到了文化建设的朝阳，听到了文化建设的涛声，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已成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革命者的迫切愿望。

在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群体中，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他以博大的胸怀和睿智的思维，首先提出在弘扬炎黄文化的同时，必需高扬长江文化研究的旗帜，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开拓新视野；同时，他又指出研究中国文化不应提倡复古主义，而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他说不热爱中国文化就谈不上爱国，更谈不上爱社会主义，赋予研究中国文化以时代价值。陈沂老对本校成立长江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十分关心，不仅亲临长江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还应大家的请求欣然答允担任名誉所长，对开展长江文化的研究工作寄予厚望。

浩浩长江与滔滔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长江文化历史悠久而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她是中华文明多元性、兼容性、开放性和统一性的体现。上海师范大学是多学科的高等学府,有条件且有能力和能力按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地理学、军事学、语言学、戏曲艺术学、桥梁建筑学等进行跨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把长江文化的研究一步一步地向纵深推进。这样做,不特可以深化本校的教学改革,而且对发挥长江文化的辐射功能、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令人高兴的是,长江文化研究所的全体同仁,在担负繁重的教学与研究任务的同时,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从文化源流、书院群落、山川形胜、人文景观、衣食文化、戏曲艺术、基督文明、城市特色、海派文化、当代上海文化建设思考等十个命题,融汇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于一炉,以“百川汇海”的恢宏气势,完成了长江文化研究的第一本著作《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她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了长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结构深沉,使我们领略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文化风采。

值此《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出版之际,我谨对长江文化研究所的良好开端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再接再厉,写出长江文化丛书系列,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说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意思是说事情开头也许比较简单容易,但发展到后来就会遇到许多难题。然而学术贵在创新,成就来自坚持,深望长江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信心,有毅力,倾心学术,追求卓越,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做出新贡献。是为序。

王邦佐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于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前 言

万里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它以浩瀚的气势、深邃的蕴含，在世界的名川大河中占着三个第三：全长 6300 公里，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尼罗河，占世界第三；每年输入海的总水量约 10000 亿立方米，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刚果河，占世界第三；长江水系的水能资源总蕴藏量约 2.68 亿千瓦，占世界第三。长江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八省、一自治区、一直辖市，落差 5400 米，它的干、支流几乎滋润着神州大地的半壁河山。长江无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的象征。

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已经足以表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长江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人类学界根据已发掘出的化石，一致认为人类的历史大约有 400 万年了。在中华大地上最早的直立人是在长江上游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被称为元谋猿人、元谋人。元谋人是历史的开端，距今大约 170 万年。

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大量出土的各类文物证明，在那里生息的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手工工艺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被称作河姆渡文化。在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发现了同属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遗址，称作马家浜文化。属于马家浜文化的遗址，在上海市青浦县崧泽、江苏省吴县草鞋山，也陆续被发现。

在浙江省余姚县良渚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金石并用

时期的文化遗址,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称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带遍布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周围,江、浙两省的吴县、吴兴、杭州,上海市闵行区的马桥、松江县的广富林、金山县的亭林,都有重要遗址发现。良渚文化的特点是玉器的数量多、品种广、制作精良。尤其是草鞋山出土的玉琮、大玉璧,武进县出土的大型玉琮,年代之古远和制作之精良,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绝无仅有的。这些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已经创造了极富特色的玉器文化。而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则发祥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丰富的考古文物和留存至今的史籍典章表明,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和中国的远古社会,长江流域和长江人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是由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共同营建、交融而成的。

在人们的心目中,乃至在人们的理解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北京猿人是华夏的始祖。实际上,这是不完整的。造成这种不完整的理解的原因之一是,北京猿人在中华大地上被发现最早、出土化石的数量最多,改变了当时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已有结论,曾轰动全世界,影响极大。

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早有各种化石发现,故被称作龙骨山。1929年12月2日,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龙骨山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这一伟大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震动了全世界。从那时至1949年,先后发掘出5个头盖骨、15块头骨碎片、14块下颌骨、147枚牙齿。1959年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下颌骨,1969年又发现了1个头盖骨。在一处地方,发现69万年以前的人类活动遗址,出土文物的数量如此之多而且个体如此完整,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裴文中教授在龙骨山的发现,在考古学上的地位有如牛顿的发现对于物理学一样重要。

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的原因之二是,产生于神圣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时的《黄河大合唱》，那激越的音符，悲壮的歌词，在民族危亡的险要时刻，激发有良知的中国人万众一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保卫民族生存的新的长城。黄河作为中华民族之魂，已烙进中国人的心坎。时代的需要每每超越历史的时空，不过在冷静之余，感情毕竟不能和科学划等号。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在唐以前的历代王朝，或发祥于中原腹地，或建都于黄河沿岸，黄河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尤其是上古社会的夏、商、周三代，都以黄河为基业。

凡此种种，加上黄河、黄土地、黄皮肤，以及传说中的人文初祖黄帝，“四位一体”，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个并不全面，但是共同接受的概念。

当然，现在绝对不是说要改变已经共同接受的概念，把长江上升到中华文明的第一发祥地，奉元谋人为中国人的始祖。实际上，在东亚这片土地上的各大河谷，包括长江、黄河、珠江、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自远古时代起就都有人类活动，并共同创造了中华古文明。中华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圈相比，更显出它独特的多元性、兼容性和统一性。研究长江文化正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这一特点。

长江和长江流域同黄河和黄河流域相比，拥有更为优越的自然条件。钟灵毓秀，也就人杰地灵，各方风流人物几乎都荟萃于长江两岸。文学家和诗人感怀长江的浩荡气势和山川形胜，豪情勃发，锦绣诗文被千古传诵；军事家着眼于长江作为天堑的险要形势，导演了诸多叱咤风云的战争活剧，令后人永远感叹不已；政治家关注长江足以牵动全国的地位，把长江作为治国的砝码，留下桩桩评点兴衰的业绩；理财家看重长江可以安天下的富饶，把长江看作国家的经济命脉，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作为王朝的生命线，至少有近千年的历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文化思想，有哪一部重要的篇章可以离开长江呢？

千百年的努力,千万人的关注,长江这条中华大地上的巨龙越来越活了。自南北朝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历史愈移近,倾斜面也愈大。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文化也愈加发达起来,尤其是下游三角洲的水网地区,“繁华”二字几乎成了长江文明的特色。长江下游地区的物产、山川、花木、建筑、艺术、服饰、饮食、陶瓷工艺,几乎都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导致北宋王朝覆亡原因之一的花石纲,客观上说是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层迷恋江南的山水花木、园林建筑和声色犬马,以致北宋朝廷的皇帝也不惜耗损国家经济、行政能力,恨不得把整个江南搬到汴梁。北宋以后,“花石纲”这一名称虽然没有了,但是封建上层统治者,以皇帝为首,都按各人的权力、能力的限度,在北国的大环境中构筑江南小天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江在中国的地位和意义。

长江还为中华大地洞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滔滔长江把上自巴蜀、下至江南的水网地区连成一气,不息地流向东海,汇入太平洋;长江也把长江人的眼光和企盼带向神州大地以外的世界。长江水连全世界,自然也接纳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使之溯江而上,辐射、扩散。宋代以来,长江已是中国和海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到了近代,长江开始谱写对外开放的文化新篇章。明、清以来,沿江两岸崛起一系列近代城市。长江流域崛起的近代城市,无论是规模、布局、建筑、功能体系,都具有不同以往的实用性、开放性、消费性、商业性等特点,自成一格。

长江接纳的外来文化中,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早在1300多年前就进入了中国。唐贞观九年(635),以主教阿罗本为首的布道团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出西郊迎接,并安排他们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讨论福音道理。经过几年的观察与研究,唐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下诏准其传道,唐政府出资在长安城内的义宁坊建造了一

座礼拜堂。自此开始,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的200多年里,除武则天掌权的一段时间外,基督教一直受到唐朝历代皇帝的保护和支持。

剧变发生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唐朝皇帝下诏灭教。灭教诏书虽然是针对佛教的,基督教也受池鱼之殃。问题在于佛教在中国是春风吹又生,基督教却自此真的被逐灭了。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教士那及兰率5名教士来到中国,意欲重整基督教,再播福音,结果是怏怏而归去。他们经过几年的调查与工作,结论是:中国的基督教已经灭亡,根本不具备传教的条件。基督教在中国被唐武宗的灭教诏书所消灭,宗教史专家江文汉先生在《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中认为,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在中国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传教圈子狭窄,仅限于皇室贵族及西域商贾和使臣,一旦皇帝采取不友好的态度,整个事业也完了。

江先生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宗教的生存、兴衰都和社会的生存与兴衰息息相关。人们过分地强调宗教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却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一起,迎来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是迎接新时代的两只臂膀。

宗教的产生和传播,说到底都要有相应的文化依托;如果离开社会意识观念的依托,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水上浮萍。公元1世纪,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一带产生和开始传播时,境遇比唐武宗灭教还要倒霉:教主耶稣被罗马总督抓起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教徒遭杀戮和驱逐。即使如此,基督教在西方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很快就传播开来。当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种传说,但是基督教开始时受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则是历史事实。可见,宗教的传播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命运如何,统治者的态度固然重要,但也不是绝对的。

对于中国来说,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外来的“洋教”。佛教在中国拥有那么广泛的信仰层,重要的原因是佛教来到中国以后,就“入乡随俗”,中国化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筑,乃至科学、思维、观念、饮食、社会习俗,无不深深地体现出佛教的影响和痕迹。唐武宗以后的近一千年间,中国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了西方基督教的观念、意识形态,没有了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与交汇。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需要广泛的相互吸取与交汇,单向的近亲繁衍只能导致衰退与停滞。中国的中世纪社会,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失去了基督教文明的滋养与交汇,是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东方社会的典型性、稳固性的原因之一,这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不幸?!

江文汉先生在该书中还认为,基督教闯不过唐武宗灭教这一关,另一原因是基督教离开中心太远。这一见解也是有道理的。

佛教的中心在南亚,伊斯兰教的中心在中亚和阿拉伯半岛,基督教的中心在西欧。从距离上说,基督教的中心距中国最远。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社会,这三大宗教都是从中国的西面,经“丝绸之路”传入的,在基督教中心与中国之间,横着伊斯兰教中心和佛教中心,隔断了基督教中心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也许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近一千年没有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需要看到,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反差极大。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儒家文化的一整套严密的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渗入中国社会机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和每一个细胞,形成一种特异的排他功能和消化功能,这对基督教文明的传播来说也是一种坚厚的壁垒。

阻碍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社会的障碍,都由长江的吞吐古今、兼容中外的独特优势而得以缓解。

19世纪初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既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先导的一面,也有作为神职人员布道,传播西方基督教文

明的一面。历史地、客观地认识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两面性,对于深入研究和发扬长江的开放性功能,推进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必要的。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他先期在广州,通过编写小册子和为人医病等途径开始布道。马礼逊在广州开设简易施药局,以治病救人的实效,显示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功能。他为欧美的儿童教中文,为中国的儿童教英文。他收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蔡阿高,第二个信徒梁阿发,全是中国社会底层的“布衣”。马礼逊不仅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译成中文,还编写了30多种小册子,出版多种期刊,特别是编纂了当时堪称巨著的三卷本《华英字典》。马礼逊的传道条件根本不能与受到唐太宗礼遇的阿罗本相比。但是马礼逊立足于沟通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社会文化与科学知识,于是就超越了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社会的障碍。马礼逊的直接继承者郭士立为了传教而学习医药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他几次到上海作实地调查(包括为侵略作准备的军事侦察),认准了上海是辐射和传播基督教的中心,开拓了传播基督教的新通途。终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想、意识观念、科学技术,乃至社会习俗,随同基督教一起源源而来。基督教文明同原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汇,使长江文化演进到兼容中外、生成新色彩的新阶段。新色彩文化的代表就是海派文化。

今天,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有理由认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和长江的开放性功能受到双重抑制有重要关系:先是受到本国封建统治者不断的海禁、直至闭关锁国所抑制;继之又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抑制。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国策,才卸下历史的沉重包袱,长江开放性的社会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潮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必须进入国际潮流,游离于国际潮流之外